

書 叢 海

高橋清吾著

政治思想之變遷

姜蘊剛譯

行發店書善美真

1 9 3 0

巖 海 叢 書

高橋清吾著

政治思想之變遷

姜蘊剛譯

眞美善書店發行

1 9 3 0

原著者序 (譯文)

友人姜蘊剛君，現在已經將拙著政治思想之變遷由中國文字譯出來了。思想是無國界的，人情是無東西的，而今這本書由對於政治思想造詣甚深的姜君之手介紹到中華民國同學諸賢去，實在是令我最為欣快莫名的事體了。

千九百二十九年十一月三日於東京

高橋清吾

原序

本書是從政治教育的立場上，概觀的講述自歐洲古代到現代的政治思想的書。故著者於說明各思想之內容的時候，在可能範圍內，務以平易簡切爲旨。

在本書對於柏拉圖 (Plato) 及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思想是比較的詳爲敘述。因爲，我想關於這兩大思想之正確的理解，是構成研究政治思想之基礎的。

已經收錄在本書中的各家思想，著者於他日發表政治思想史概論時，再爲詳述。

末了，當本書出版的時候，著者曾得小中定二學士爲整理材料，又煩野島辰次郎爲之校正及製作索引，均皆於此深表感謝之至意。

千九百二十八年十一月六日

高橋清吾

— 序 —

(4)

緒 言

——甚麼是政治思想——

所謂政治，雖由人的立場不同而用種種的方法表現出來，但若是科學的以事實爲事實來觀察，則政治是以「一部分人們擁有着強力——物質的——支配他人的事實」爲主要之內含的。但是，這個事實即這個政治的事實，僅是這樣，尙不能獲得人們之承認。

人若是像犬和馬那樣低能的動物，或者是和爲動物的獅子與虎一樣，只是盲目的，毫無異議的服從強者的支配，也是說不定的；但是人類是一面自己有意識，并且有理智，同時又是社會的。所以沒有理由的話，那是不會受物質的力的支配。他從恐怖的感情服從強者的時候也有，或是從利害的打算，服從強者的時候也有；或與此相反，他從自己的力的意識，或是從一種優越的感情，否定強者的支配的時候也有吧？但是人類無論在甚麼時候，都不忘去

自己行動的理由化支配，或是被支配，或是拒絕支配的時候，都要尋求給自己行動辯護的理由，由這個理由對他人來辯護自己，同時來滿足自身的理智。

古代希臘(Greece)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是擁護當時奴隸制度的一個人，他對於奴隸制度有這樣的理由：「人類的裏面，有的人支配別人，有的人被人支配；這種情形，不但是必要，而且是便易的。并且人類裏面之某種人，生來是被定為服從者的，其他的人是附屬於支配者之運命中的。再者支配者與服從者之關係有很多的種類：持有優良的服從者之支配，說是善良的；譬如說支配人的這事，比支配猛獸是優良的。所以由熟練的職工們所作的事常是優良的，只要是事業存在的地方，必定存在着一種支配力服從者之關係。

「因此在人類行着專制的或中庸的兩個支配，前者即是性靈支配肉體，後者是理智支配體慾的時候；但是依性靈支配肉體，依合理的素質支配性慾這件事，是自然而且是便宜。反之，雙方的平等，或者劣者的支配常是有害的。

「這個原理普及於一切人類，像這樣只要是存在着性靈與肉體，人類與獸類間之差異，無論在何處，劣種的東西，不但是生來該為奴隸的，并且劣者立於主人的支配下，在他

們自己看起來是幸福的。我想受他人的支配，並且沒有理性，只能了解他人理智的人，天生是奴隸。……自然隨着上述之法則來分別自由人的身體，或奴隸的身體，即是使後者強壯，使適於奴隸屬的勞動，同時鍛鍊強者，使他有用於戰爭與平和兩種技術上政治的生活。要而言之，有的人天生是自由的，有的人天生得是奴隸，並且在後者自己看起來，奴隸一事反是便易而且是正當的，這事體由上述而可以明瞭。」（參攷拙著歐洲政治思想史九十九頁以下）就是奴隸的制度是當時的「事實」，亞里士多德對於這事實說出了上述的那樣「理由」。

政治思想是對於政治的事實的人們利害感情上加上理由。換言之，政治思想是將對於政治的事實的人們所懷抱的利害感情——廣義的感情——理論化了。總而言之，說政治思想是從人類利害感情不同起來的，不算過度的話。世上的一部分人對於「以思想對付思想」這種理智主義者之呼聲，當着真理來歡迎似的。但是若對於政治思想說來，以思想來應戰思想，是沒有効力的。無論你如何，以理由來應戰理由，歸結起來，只成了表面上的空論。不信仰社會主義的教師，對於對社會主義持有宗教的情熱的學生，無論如何的說：「你錯了！」總是不能變更那個學生之信念的。這是爲甚麼呢？是因爲利害感情的不同。即是因爲對於

同一事物，人人的利害感情兩樣，不論怎樣以思想對付思想來說教，是沒有効力的。要是搖動根本的利害感情的事體，算是例外。只要不是那樣，所謂拔本塞源的意義的思想善導是不可能的。無論你怎樣來施行教育，要得到預期的結果却是困難，不，我想是近於不可能的。

像這個樣子，政治思想是多樣的，一方面有不得已不承認『力的支配』的人，他方面則不然，絕對不承認理智的支配。政治是『正義』支配的東西，就是正義不實現，最低限度也不會沒有主張『公開的支配』的人。還有一部分人說，政治家不是能依賴於法律的，要得以自身之『德』來引導人心，即是甲是甲，乙是乙，丙是丙，這樣個自的，皆持有個自的想法，這是因為甲乙丙的利害感情兩樣，所以不同的理由也生出差異來。

有些人似乎以為『真理不就是一個嗎？甲乙丙思想的不同，不管其怎樣的不同，善總是善，惡總是惡，以善惡的標準來判斷他們，不也就區分明白了麼？』把這樣觀念來作他唯一的想法。但是這樣想法的人的主觀的信仰是不對的，拿來做科學的觀察的方法，簡直是謬誤。對於同一事物，人們的利害感情若是完全相同，這種理由也就可以統一的，或者可以說是

感來幾何，說甲是善的，乙是惡的。然而在人們利害感情差異的時候，誰也不能以絕對的權

中國的學者政治家子產說過：「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們的欲望是無窮的，而且人們的利害感情雖有同一的時候，而其差異的時候較多得遠。此思想是主觀的。再者雖同爲一人，而因其人境遇之變化，思想也未必一致。例如青年期是社會主義的人，到了中年以上變爲保守主義的是很多的。所以在世界上，甲的理由思想較諸乙的思想是善或惡，要用客觀的決定的來規定牠，是沒有道德的標準的。思想是「質」的問題，不是「量」的問題。因此之故，假定百人之中有九十人或者是九十九人是同一意見，其他十人或一人是持反對的意見，這十人或是一人的少數意見便說是惡的話是不能夠的。不管甚麼人，這樣的話，是不能客觀的說的。若真理只有一個，從古代思想家的偉人孔子釋迦耶穌(Jesus)梭格拉底(Socrates)等說的種種的事，那應當很充分的。至少，我們依據這些偉人們的言論，毫無迷惑與遲疑的，仰爲指導的原則，應當說是對的。然而在今日的我們，爲甚麼不一定全部的去接受孔子或梭格拉底的思想呢？佛教徒或耶穌教徒自不必去說他，我們很多的人便對於佛典或聖

經的某部分，就持有異議。這是甚麼緣故呢？不用說，這是由於我們的利害感情是不同的。我想由此當可了解思想上的真理不是一個。像這樣，所以想着思想是不甚可依賴的。確實，思想是持有可依賴與不可依賴的性質。如前面所說，思想統一，是專持理由是無效的，根本還在只要人們的利害感情一致之外，是沒有其他的方法。但是說到實際問題，這就太困難了。因此，使超越於普通以多數者的意見爲輿論的事實和權力者之背後持有物質的強力的少數者意見，同時壓抑着其餘的諸思想，社會乃可前進。

這樣，政治思想是主觀的，因之其內容首先是政治的事實之批判 *Justification*，社會的意義之發現。包含着新指導精神之樹立，新政治組織，新政治方法之發見思索等。有的思想家的思想雖不包含着這個政治思想的全部，不能即說牠不是政治思想。雖只是一部分也無妨的。研究政治思想之變遷，要是科學的研究牠，而求明悟牠的異同，這就是政治思想史，因此，在此種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史乃爲政治科學之一部門。

可是，要科學的去研究政治思想之變遷，怎樣的條件是必要呢？第一，我們不能不研究我們將研究的一定的政治思想的時代的背景。即是那個思想產生的一時代，一社會之政治

的社會的背景，有詳細調查之必要。有的人以爲「政治思想是理智的產物，牠是理由，是理論，所以是由思想家的頭腦中榨出來的，所謂純理的所產。」但是維持數千年之廣而且長的指導的地位的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却不僅是這樣單純的理由。他對於當時的社會的環境，持有很深的利害感情。他將這利害感情，集於他的銳敏的組織的頭腦，而加上自己的理由。這樣，他的思想乃得產生了出來。

第二，我們不得不知道古時代傳下來之諸思想或議論的立場，即研究的方法。仔細研究思想之變遷，可以說思想并非全然嶄新的，這話實不是過言。譬如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在日本最近的思想界算得是風靡一時了，然而這個思想是很嶄新的嗎？不是的。那個思想在古代希臘已有很多的議論了。這個在後章述啟蒙時代的諸學說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諸思想的研究中，可以證明。唯物史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或「階級鬥爭」并不是馬克思開始唱導的。至於馬克思之「辨證法」（Dialectic）也非是他的獨持之見。這些，皆是發源於希臘之古代。馬克思所獨持的，或是稍近似於獨持的一點，只不過是國際的社會主義而已。我想，把這個來評價馬克思思想的貢獻，或許不錯的吧？

第三，我們不能不研究各個思想家的爲人的性情。同在一舞台，若演員不同，戲園也自不同。同樣的，在同時代同社會所產生之思想家等，若其爲人之性情不同，其思想亦自顯著的差異。例如英國的霍布士（Thomas Hobbes）及密耳敦（John Milton）同是十七世紀的思想家。十七世紀之中葉，在英國清教徒革命起來的時候，霍布士非常恐怖革命而逃到法國去了。他究竟是一個書生，愛好平和及平靜，鬧雜的事比較任何一切都嫌厭的。他雖富於理智，同時也帶着多少怯弱的病。反之，密耳敦當革命勃發的時候，他正在意大利旅行，一聞革命，他便急遽的回國來投入克林維爾（Cromwell）等革命軍中去了。密耳敦是詩人，因之是創造的，同時也是熱情的，而是一種冒險者。與此同樣的事，關於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可以一樣的來說。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弟子，兩者的境遇，在大體上是大同小異的。柏拉圖出自貴族，亞里士多德的父親是馬其頓（Macedonia）王菲里彼（Philip）的侍醫，雖是那樣弟子與先生却提倡很不相同的思想。柏拉圖是於後章要說的，到底，他是很貴族主義的，論理的，情熱的詩人，荒療治的改造論者。反之，亞里士多德是持有診察重患者名醫樣的冷靜與質實者。他是靜中調脈，從患者之病狀上去開藥方那樣風度的人。他是對於實

際的政治家等，處於像教導：「你要這個樣子！政治家不得不這個樣子！」的地位的人。柏拉圖比着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就是突進的，冒險的人，他是任何事都趨於理想的人。反之，亞里士多德則不然，他是持着「即使這樣的急着，實際是不能像理想那樣子行的，因之，「喂！請你待着，緩點兒走罷！」」這樣現實的，實際的一方面的。像這樣的例子太多了，舉不勝舉，那就只能就此為止罷。

要而言之，當研究一定的政治思想的時候，對上邊所說的三個條件，不可不加以攷察。因為那三個條件是有相互間的影響，而構成各思想家之背景的。

譯者小言

在去年的暑假後，到高橋先生家裏去時，先生便贈給我一個薄本的講演速記稿印刷冊子，題目叫着政治思想之變遷，說是於暑假中在海軍社盛大講演會中之講稿。我看了這個題目便覺得很中意，但內容總共不過是一兩萬字的吧？居然從古代希臘的啓蒙思想運動而直談到近今蘇維埃意大利等的獨裁思想，我暗中想這總算有魄力，可惜就是太簡略了。

又在去年十二月的初旬，怎樣與先生談到那本講演速記稿的事，先生說較詳的書已經出了版，這裏已送來一本樣子，待我看一遍送去，便正式出書了。我不禁一驚，取樣本來一看，居然已成了這末一個六百幾十頁的厚書！舉頭一望先生健康而富有突進精神流露的紅顏面，不單是拜服了先生，自己是羞慚得無以自容；學者的先生在何時竟寫成這末一厚本書，

我則由秋到冬，雖常隨伴先生，結果竟無所成就！於是令我有些感奮了。

原本的政治思想之變遷已經排列在我的書架上又數月了，先生希望我寫的「中國政治思想」的東西，雖然也寫了些，但要說到成一本中國政治思想史，我屢次由圖書館的書庫中走出來，都覺得有些廢然！自己愈是羞慚得無法，便愈覺得很感奮的。然而春光易逝，仍無所成；羞慚與感奮的結果，究用甚麼來報償呢？

今年暑期，本因事要回到中國之南方去的，八月一日由東京乘車到了神戶，在途中發病，遂又再折返東京來了。回至東京後，移居於郊外阿佐谷友人之別墅中，忽而想起要譯政治思想之變遷到中國去，一來可以渡此炎熱之長夏；二來可以將介紹代替著作；三來可以補濟未曾回中國做要做的事；有此三點理由，益發決心於謄譯了。於是在此蟬鳴高樹，揮汗如雨的綠窗之下，鼓着勇氣，埋頭直前，一字一字的寫，真有些像蝸牛上壁般的，總覺着進行得太慢了。但一想到高橋先生著書時之精神，也就不嫌其麻煩與感着疲勞；反而進行得更爲猛烈。

譯這書的開始時，得友人夏文運君的帮助不少，譯到一半時，已經又大發病象了，我只